

广交朋友
的周恩来

益友
良师
同志
领袖

● GUANG JIAO PENG YOU DE ZHOU EN LAI



领袖·同志·良师·益友

——广交朋友的周恩来

主 编 郑毅涛

副主编 郭树云 刘建华

张志宏 李庆田

红旗出版社

责任编辑 毛传兵

封面设计 潘岱予

领袖·同志·良师·益友

——广交朋友的周恩来

郑毅涛 主编

*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沙滩北街2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 9.5 字数 21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册

ISBN 7-80068-194-7/D·66

定价 4.00元

撰稿人

丁 泓
李 庆田
陆 少华
韩 洪洪
瞿 洲仁

刘 建 华
张 兰
郑 毅 涛
黎 清
魏 濂

李 玉 生
张 志 宏
郭 树 云
潘 菲

目 录

-
- 1 总理与爱国老人沈钧儒
7 友谊永存
——周恩来与陶行知和育才学校
13 深挚的情谊
——周恩来与宋庆龄
25 半个世纪的革命友情
——周恩来与郭沫若
37 周恩来与和平使者张治中
48 总理与女豪杰林巧稚
62 忘年交
——周总理与齐白石
73 总理与盖派创始人
85 “我来作你的入党介绍人”
——总理与程砚秋

- 92 周恩来同志和张学良将军
- 102 相遇贵相知
——周恩来与马寅初
- 113 知音
——周恩来与李四光的交往
- 127 领袖·良师·知音
——总理与几位艺术家的交往
- 138 周总理与宗教事业及宗教界人士
- 147 悠悠故乡情
- 162 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同几位普通人的交往
- 171 同窗情
——周恩来与王朴山、常策欧的友谊
- 175 共和国总理与北洋政府代总理
——周恩来与朱启钤的交往
- 183 关怀与怀念
——周恩来和于右任、屈武的交往
- 192 总理对老中医的关怀
- 200 “程思远先生回来，我们也欢迎”
——记总理同程思远的一段交往
- 206 周恩来与徐悲鸿
- 217 周总理与老舍
- 226 良师·益友·同志
——周恩来与邹韬奋

- 234 情系松花江畔
——总理与陈沂
- 237 “别怕，你的过去，我们了解！”
——总理与画家刘海粟的交往
- 242 总理的家宴
——同日本友人的一次交往
- 247 周恩来与斯诺
- 256 总理与画家张大千夫人杨宛君的交往
- 258 深情的关怀，无限的思念
——访烈士子弟杨明和曹云屏兄弟
- 265 周总理关怀荣毅仁
- 268 一张名单见深情
——记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关心与保护
- 277 周总理与科技工作者心连心
- 293 后 记

总理与爱国老人沈钧儒

沈钧儒，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出生于士大夫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清末进士，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他一生追求真理，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从事革命工作。他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地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靠拢党，相信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真心实意地接受党的领导，坚持革命的原则性。他的思想所以能够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其中尤以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远。沈钧儒与周恩来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彼此肝胆相照，结下了极为亲密的革命友谊。

沈钧儒与周恩来的初次晤面是在南京，时间是1937年夏。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936年5月，沈钧儒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会正式组成，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因而更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摧残和迫害。¹¹

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人被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的6项条件中，第二条即为“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这里提到的“上海爱国领袖”，就是指“七君子”而言。这对沈钧儒的思想震动很大。这时他俩虽未见面，相距千里，但革命的共同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1937年夏，“七君子”从苏州监狱释放不久，沈钧儒就来到南京，这时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8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了一个茶话会，沈钧儒应邀出席。真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他神交已久的周恩来，二人又约定次日9点钟在办事处会面。周恩来说，万一他不在，可以与叶剑英同志谈，叶剑英是完全可以代表他的。第二天，沈钧儒见到了叶剑英同志，谈了救国会的工作以及“七君子”出狱后的情况。叶剑英同志一方面对救国会致以慰问勉励，一方面说他将救国会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

武汉沦陷以后，沈钧儒和周恩来都到了重庆。周恩来除与国民党政府作面对面的斗争外，还始终关怀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团结争取聚集在重庆的各党派爱国民主力量。这一时期，他们接触颇多，活动也相当频繁。

当时，重庆上清寺鲜特生的住所——“特园”，是各民主党派经常集会和活动的场所。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黄炎培和爱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李济深，还有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都常常

光顾“特园”。高朋满座，谈笑风声。周恩来便利用这块特殊的地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见面，分析形势，指明方向，从各方面帮助与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他常常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和形式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如利用沈钧儒、郭沫若作生日时的集会，作为宣传团结抗战和揭露国民党阴谋投降、压迫人民的讲坛，从而吸引和团结了各党派抗日爱国民主力量，揭露和孤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因而，“特园”被誉为“民主之家”，并由郭沫若题了匾额。

1943年7月初，周恩来因事暂时离开重庆，时隔1年5个月之后，于1944年11月，又飞回到“山城”重庆。当时的重庆一片黑暗，周恩来的到来，宛如黑暗中忽归秉炬人，给烟雾笼罩下的“山城”带来了光明。11日，他参加了郭沫若欢宴柳亚子的集会。集会后，沈钧儒喜而作诗云：

经年不放酒杯宽，
雾压山城夜飞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
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
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笑狂欢俱未足，
河山杂遘试凭栏。

诗中的“有客喜从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很明显，沈钧儒寓情于诗，他通过对周恩来的

爱戴，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

抗战胜利后，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彻底粉碎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周恩来在百忙中还安排毛泽东与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见面。1945年9月2日，毛泽东应邀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鸡尾酒会。事实上，这是一次欢迎毛泽东同志的盛会。沈钧儒、郭沫若、张澜、冯玉祥等人都出席了这次酒会。在此期间，周恩来仍利用“特园”这个特殊的场所，及时地向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谈判的经过和进程，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和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的真面目。

为便于谈判和斗争，在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返回南京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也于1946年5月3日到达南京，以南京的长江路梅园新村30号、35号、17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办事处；以上海的马思南路107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沈钧儒住在上海，他经常往返于（南）京沪之间，与周恩来联系。周恩来及时将美国的“调解”真相，以及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诡计，告诉了沈老和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在周恩来的影响和鼓舞下，沈老与郭沫若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揭穿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阴谋。

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国共和谈破裂之后，周恩来奉党中央电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的办事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亲自将钥匙交给沈钧儒，还将放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的一个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如意赠给沈老，这表示了党对沈老莫大的

信任。那时候，周恩来表示：从各方面看来，再经过几年的苦战，蒋介石的进攻，是能够被粉碎的。……看形势，三、五年之后回来，可能性很大；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所以，周恩来赠送给沈老这个瓷如意的寓意是很深刻的。全国解放以后，沈老住在北京，他把这个瓷如意放在小客厅里作为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老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沈老与周恩来晤面的机会就更多了。这时，沈老对党的忠诚和爱戴与日俱增，老而弥笃。他曾几次说：“我很想再活 20 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了。”说话的时候，沈老的表情非常严肃，象是有点遗憾，又象引以自豪。一心向往党的事业，完全接受党的领导，一切服从革命需要，这就是沈老在和党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

1963 年元旦，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主持团拜会，招待在京 70 岁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人和参事中的老人。同时为沈老 90 诞辰祝寿。周恩来在致祝酒辞后，转向沈老说：“沈钧儒老人今年 90 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沈老听到周恩来的祝辞，十分激动地起立举杯祝酒：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正确地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提议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长寿、祝大家健康长寿。周恩来这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对沈老的高度评价，

也是对他一生经历的最好总结。回家后，沈老激动地对家人说：“没有党和毛主席，哪有今天！”

这是沈老最后一次参加的宴会。这时，他的身体渐见衰老。6月初，他突患急性支气管炎，住进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于11日逝世。

沈老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不愧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在与周恩来交往时，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彼此之间互相敬重。沈钧儒为知识分子不断地探索进步树立了光辉榜样。

友谊永存

——周恩来与陶行知和育才学校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南京、上海郊区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抗战时期直到逝世，他都积极从事民主运动。陶行知由一个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不屈不挠的民主战士、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与党对他的教育、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怀、帮助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陶行知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办育才学校，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在学校里成立了党支部，开展党的工作，帮助陶行知把学校办好。抗战期间，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化龙桥《新华日报》馆都是大后方人民群众非常向往的地方，因为从这些地方可以听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声音，使人们透过迷雾看到前进的方向。陶行知非常信赖共产党，他象其他民主人士一样，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内部发生问题，育才学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到“周公馆”去，向周恩来同志请教，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对付

办法，许多问题一经周恩来指点，顿时迷雾驱散。这使陶行知受到深刻的教育和极大鼓舞，并由衷地钦佩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伟大革命家的气魄。陶行知感慨地说：“去时腹空虚，回时力无穷。”

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民主人士的活动日益加剧，形势异常紧张。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陶行知，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它们常找借口要封闭育才学校。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40年一个秋夜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到陶行知的住处，向陶行知讲明形势，指出育才学校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愈在困难的情况下，愈要树立必胜的信念。第二天，陶行知还陪同周恩来同志看望了一些文化界、教育界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第三天陶行知又陪同周恩来参观了育才学校。周恩来同志满面笑容，亲切地向师生们问好。他一边喝着学生用瓦壶给他倒的白开水，一边回答大家关心的时局问题。周恩来同志谈话中特别指出，要反对投降活动，打击国民党的投降派。周恩来说，斗争的形式很多，根本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在座的有的搞戏剧，有的搞音乐，有的画画，我看通过音乐演奏、绘画展览、戏剧演出，都可表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都是有力的战斗武器嘛！他还说，我们走了多少弯路，吃了多少苦，才找到革命的真理，可你们呢？现在就能学到革命的真理。真是一代胜似一代啊！谈话结束后，同学们围着周恩来同志，掏出本子要求他签名。周恩来同志高兴地接过本子，在上面写了“一代胜似一代”。离开学校时，周恩来同志还为学生增加营养、购买体育器材捐款400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

有这样一幅手迹，上面写着：“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先生来校参观之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担任，”还开列了饭钱和坐船费数字。这不仅反映了陶行知和周恩来的珍贵友谊，也可见陶行知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

党的关怀，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教导，给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师生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1943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育才学校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使陶行知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不仅要顶住种种政治压力，还要天天同飞涨的物价“赛跑”，为学校募捐经费。有一次陶夫人问他：“你为育才，天天出去募捐，实在太辛苦了！为何不去延安？”陶行知坚定地回答说：“我若一走，师生都要遭殃，育才学校可能和晓庄师范一样，被蒋介石封闭，所以我非在这里顶下去不可。为新中国培养人才，我吃点苦，何妨！”就在这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和董老派专人送来了毛泽东在延安号召解放区军民开荒生产自给的一套照片和一件延安织制的灰色毛线衣。陶行知收到这珍贵的礼物，心情非常激动，对党倍感亲切。他们仿照延安的做法，动员全校师生开荒生产，开展“寸土运动”，在师生们的勤奋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度过了难关。

1945年，当日本帝国主义行将投降时，为迎接新的局势，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究了陶行知的工作。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的心目中威信高，影响也大。但这些年创办育才学校，几百个孩子的生活要他操心，常为孩子们衣食住行累得精疲力竭，影响了他做社会青年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建议让陶行知从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青年运动上。陶行知遵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不久

便和郭沫若、李公朴、史良、邓初民一起在重庆办了一所社会大学。开学时，周恩来同志参加开学典礼，并讲了话。以后，陶行知积极参与了许多民主活动和斗争。

抗战一结束，重庆的一些党的办事机关撤走。周恩来考虑到育才的校舍较紧，便把八路军办事处的房舍让给了育才学校，还托人经香港汇入了 800 块银元给留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师生。此后，陶行知经常邀请周恩来等同志参加育才学校的一些活动，周恩来只要有时间，总是有请必到。这年冬天，育才音乐组同学举行儿童音乐演奏会，陶行知邀请了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和冯玉祥以及中外记者参加。演出后，周恩来高兴地给音乐组同学题了词：“为新中国培养新的音乐人才。”1946 年，叶挺将军出狱后，八路军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欢迎晚会，育才学校音乐组参加了晚会并演出了节目。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人也参加了晚会。周恩来同志还在育才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下讲了话，他鼓励同学们“要做小先生，为人民服务”。

在党的引导下，陶行知更积极地参加了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1946 年 4 月，陶行知为育才迁校来到上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不顾特务的捣乱、破坏和威胁，到各大中小学以及工厂讲演了 100 多场，为人民呐喊，吹响战斗号角，强烈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6 月 22 日，在上海北站 10 万群众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大会上，陶行知慷慨陈词：“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民主。”面对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蒋介石穷凶极恶地派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而且把陶行知列为黑名单上的“探花”。当翦伯赞同志打电话告诉陶行知这个消息，要他